

鲜卑石室所关诸地理问题

米文平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境内之嘎仙洞，位于大兴安岭北部顶端之东麓，屈嫩江西岸支流甘河之上源，地理座标为北纬50度38分，东经123度36分。洞内西侧石壁上，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派遣中书侍郎李敞来这里致祭时所刻之祝文，确凿地证实该洞即为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旧墟石室”。^①

鲜卑石室的发现，为我们研究东胡系诸部族的地理问题，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地理座标。本文拟据这一地理座标，就古代文献所记之大鲜卑山、大泽、乌洛侯、地豆于、难水、室韦等迄今说法不一的所在方位，试作求索，求大家指正。

一、大鲜卑山

大鲜卑山，最早见于《魏书》。该书《序纪》开头记载：拓跋鲜卑的祖先“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记录焉”。

《魏书》成书于公元554年。作者魏收在北魏末年曾参与编写“国史”。这里所述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只能是靠口耳相传而来，当时对于大鲜卑山，由于只提了这么一句，没有更具体的交待，致使后来史家对其所在位置，执说不一，分歧颇大，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种说法：1.认为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如《黑龙江古代文物》等书说：“大兴安岭北段（古时称作大鲜卑山）”。2.认为大鲜卑山是外兴安岭。如《呼伦贝尔志略》等书说：“近世舆地家谓鲜卑山即外兴安岭”。3.认为大鲜卑山在贝加尔湖一带。如丁谦《〈后汉书·鲜卑传〉地理考证》说：“大鲜卑山在俄属伊尔古斯克省北，通古斯河南。”

到底哪一说为是呢？现在，以嘎仙洞同史书所记之拓跋鲜卑祖先“旧墟石室”相比较，该有可能作出结论了。

《魏书·礼志》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同书《乌洛侯传》又载：“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经实测，嘎仙洞南北长九十二米，东西宽二十七点八米，高二十多米，与《魏书》所记石室的规模相符；洞内石壁上镌刻之祝文，内容也与《魏书·礼志》记载基本相符（个别字句稍有出入）。^②这就证实了嘎仙

① 拙文《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参见《文物》1981年第2期。

② 嘎仙洞规模与祝文，详见《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肯定的。

二、大泽

与鲜卑石室有关的另一个地名，是《魏书》所说之“大泽”。《魏书·序纪》记载拓跋鲜卑的远祖毛之后又传五世，“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

对此大泽，舆地学家丁谦在其所著《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中认为是指贝加尔湖：“于已尼大水即贝加尔湖，乌洛侯西北二十日行道里正合，《史记》、《汉书》所称北海均指此湖。魏先帝石室在湖南滨。考《魏书·本纪》载宣帝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盖指此地。即汉时丁零国也。”

但更多的历史学家认为，推寅南迁之大泽，当即呼伦湖，即当地通称之达来湖。如《呼伦贝尔志略》称：“大泽即呼伦湖。”又如马长寿在其《乌桓与鲜卑》一书中认为：“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当系一个湖泊众多的沮洳地带。这一地区，从迁徙方向与地形来说，可能就是呼伦贝尔湖区”。宿白同志在其《东北、内蒙古地区鲜卑遗迹》一文中也认为：“南迁大泽方千余里’的大泽，应是呼伦池。”并进而从考古学上论证了在呼伦湖北岸发现的扎来诺尔古墓群即为拓跋鲜卑南迁后留下的遗迹。不过，对于扎来诺尔古墓群的族属，看法仍不一致。

现在，由于鲜卑石室的发现，有了一个准确的地理座标，也就为后一种立说提供了可靠论据。它表明拓跋鲜卑祖先原在大兴安岭北段，只是到推寅时才南迁到“方千余里”之大泽。查在鲜卑石室以南，并没有可以称得起“方千余里”的湖泊，只有其西南的呼伦湖堪称得上，该湖水面南北长约二百里，东西宽约七十里，周围约五百多里。千百年来，因雨量变化，湖面时大时小。以当时之里（较现在的里要小）计算，与“方千余里”是大致吻合的。

由此联想我国先秦古籍《山海经》所记之“大泽”，也可能即为今呼伦湖。《山海经·海内西经》载：“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貂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史记·匈奴列传》载：“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服虔说：“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根据鲜卑石室所在位置，已知拓跋鲜卑早期居住地就在大兴安岭北段，即今嘎仙洞一带地方，则可推知，鲜卑之先民东胡，其住地也当在这一带地方。

再从《山海经》所记述的东胡之地望来看，“夷人在东胡东。貂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这里所说的夷人，即夫余之先民。《后汉书·东夷传》载：“夫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涉地也。”“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蒙文通以涉为夫余，貂为高句丽。弱水在此指黑龙江中游，系以今结雅河为源，其水流入今黑龙江后，古统称为弱水。^①夫余“北有弱水”，则其地当在今呼嫩平原一带。这一带的自然特点就是“最为平敞，土宜五谷”。

夫余在这一带“西与鲜卑接”，当即隔嫩江西与大兴安岭一带的鲜卑相接。先秦时代的东胡，与汉魏时代的鲜卑，地域当是一致的。故夷人（即夫余）西边的东胡之位置，自当在大兴安岭一带。这样，东胡西边有大泽，则此大泽也只能是呼伦湖。

《山海经·大荒北经》又载：“有大泽，方千里，群鸟所解。”此处所说“方千里”之大泽，与《魏书》所说“方千余里”之大泽都当同样指呼伦湖而言，因为此外别无方千里之大

^① 《汉玄菟郡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年第6期。

泽。“群鸟所解”之“解”指解羽，就是脱毛换羽。呼伦湖东南岸边的乌兰泡沼泽地带，每年春季，南雁北来在此脱毛换羽，抱窝孵化。成千上万的大雁，这时都因翅膀脱羽而飞不起来，只能在沼泽、草丛中浮游。每当这个季节，渔场工人们用长达两千多米的大网捕雁，一网能捕获数百只甚至一、二千只大雁。所谓“群鸟所解”，正是指的这种情况。^①

三、乌洛侯

关于乌洛侯的地理位置，历代看法歧异。现在，鲜卑石室已经找到，该石室位于嫩江上游西岸支流甘河上源，靠近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之东麓，水系属嫩江流域，根据这一准确的座标，也就可以查实乌洛侯的位置了。《魏书》既已明确交待“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可知乌洛侯就在该“旧墟石室”之东南，其具体位置当在嫩江中游，即今齐齐哈尔西部一带。又据，乌洛侯在唐代称乌罗浑，按现代蒙古语“乌拉”为山，“浑”为人。依此词义，乌洛侯可能即“山中人”之意，原为居住在山里的人，分布在今齐齐哈尔以西直到大兴安岭一带山地。这里地势西高东低，大兴安岭分水以东诸河川皆东流入嫩江，从北往南依次有甘河、诺敏河、阿伦河、雅鲁河、绰尔河、洮儿河等，都是流入嫩江。这一情况与《魏书·乌洛侯传》所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是完全符合的。“难”即指嫩江。

这一带地方，与《魏书·乌洛侯传》所描述的自然条件及居民习俗也完全符合。如“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民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这些景象，在大兴安岭以西（所谓呼伦贝尔城境）的干旱草原地带是见不到的。岭西干旱草原，雨量稀少，很难说是“其土下湿”。从其“多豕、有谷麦”和“冬则穿地为室”的情况来看，应是定居的农业部落，与岭西呼伦贝尔高原上的牧区景象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北魏时期的乌洛侯，应在嫩江中游西至大兴安岭山地之间，与唐代乌罗浑的位置大体一致。

我们来看一下唐代乌罗浑的位置。《旧唐书·北狄传》载：“乌罗浑国，盖后魏之乌洛侯也，今亦谓之乌罗护，其国在京师东北六千三百里。东与靺鞨，西与突厥，南与契丹，北与乌丸接。”同书又载：靺鞨“东接靺鞨，西至突厥，南至契丹，北与乌罗浑接。”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唐代乌罗护是南与契丹相接，又与靺鞨相接。据《唐会要·室韦传》载：“和解部落次东又有与罗护部落，一名乌罗浑，元魏谓之乌洛侯，居磨盖独山北，啜河之侧。……又有那礼部落与乌罗护犬牙错居。”此啜河当为今绰尔河。乌罗护在“啜河之侧”，则其南界当在绰尔河以南至洮儿河一带。其东段南与契丹相接，西段南与靺鞨相接。

《旧唐书》说乌罗护“在京师东北六千三百里”，又说室韦“其国在京师东北七千里”，依此推算，则乌罗护东北距室韦（当在今嫩江县之北，后文有专题论及）为七百里，正当今绰尔河一带。

《旧唐书》还说乌罗护之北界，“北与乌丸接”。同书《室韦传》又载：“乌罗护之东北二百里，那河之北有古乌丸之遗人，今亦自称乌丸国。”那河即嫩江，乌丸在乌罗护“东北二百余里”，又是那河之北，则当在今嫩江上游。马长寿先生在其《乌桓与鲜卑》一书中说：“那河即今黑龙江，此乌桓遗人在黑龙江以北今苏联西伯利亚东部境内。”这是不对的。如果乌丸遗人是在黑龙江以北，则与嘎仙洞东南的乌罗护相距就不只是二百余里了。实际那河不是黑龙江，而是嫩江，这一点将在后面专题论述。

^① 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

《旧唐书·北狄传》又载：“乌丸东南三百里，又有东室韦部落，在獠越河之北。其河东南流，与那河合。”獠越河为嫩江西岸的支流。獠越河之北的东室韦，以及东室韦西北三百里的乌丸，都应在嫩江以西。由此可证，乌丸西南二百余里的乌罗护，也必然在嫩江以西。

四、地豆于

地豆于，始见于《魏书·地豆于传》：“地豆于国，在失韦西千余里。多牛羊，出名马，皮为衣服，无五谷，惟食肉酪。”同书又载：“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北史》关于地豆于之记载，与《魏书》相同。此后，地豆于这个名字就不见于史籍了。

前面已经交待，乌洛侯在嫩江中游，即今齐齐哈尔以西直到大兴安岭山地之间。北不过甘河上源的嘎仙洞一线，南不过洮儿河。根据《魏书》所说，“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可知地豆于即在上述乌洛侯所在地域之正南。其北界大致在洮儿河上游，与乌洛侯相接。

地豆于的方位，应同隋唐时的靺鞨位置大体一致。《旧唐书·北狄传》载：“靺鞨，匈奴之别种也。居于黄水北，亦鲜卑之故地，其国在京师东北五千里。东接靺鞨，西至突厥，南至契丹，北与乌罗浑接。地周二千里，四面有山，环绕其境。”从地理形势上看，当在大兴安岭南段的山地之中，即今洮儿河上游以南一带地方。其东与靺鞨相接，距高句丽也不会太远。《北史·契丹传》记载：“太和三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可见，地豆于当处于蠕蠕与高句丽之间。丁谦认为，“地豆于当在南室韦西，今乌珠穆沁旗”，^①这显然是太偏西了。

根据前文所述乌洛侯之地理位置，在其正南的地豆于当在洮儿河以南的大兴安岭南段山地之中，其东界当达到洮儿河中游一带。

五、难水、捺水、那河

乌洛侯的方位既经证明在嫩江中游，即今齐齐哈尔以西直至大兴安岭山地中间这一带地方。这样，《魏书·乌洛侯传》所说的“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一语，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因为齐齐哈尔以西到大兴安岭山地中间这一带地方的小水，如甘河、诺敏河、阿伦河、雅鲁河、绰尔河以至洮儿河等，都只能是注入嫩江。故“皆注于难”只能就是指皆注于嫩江，别无其它可解。所以，难水即今之嫩江，这个问题也就最终得到证明。

长期以来，舆地学家对此意见分歧。丁谦在其《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中说“难水本曰斡难河，为黑龙江上源”。根据上面考述，此说显然不对。马长寿教授认为：“难水即《唐书》之那河，今称黑龙江。”^②把黑龙江当难水，与《魏书》对难水的描述，也有矛盾。《魏书·勿吉传》曾记其使者乙力支叙述自己赴代京朝贡所经过之路线：“初发其国，乘船溯难河西上，至太涂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和龙即今辽宁省之朝阳。太涂河同书也称太鲁水，《北史》作大岳鲁水，《新唐书》称它漏水或他漏河，《辽史》称挾鲁河，《金史》称滔尔河，《元史》称塔兀儿或托吾儿，清代称陀喇河或陀罗河，又作陶尔河，今作洮儿河。太涂、太鲁、太岳鲁、它漏、挾鲁、滔尔、塔兀儿、托吾儿、陀喇、陀罗、陶尔、洮儿，皆为同音异写。由此可知，此河名称至今一直未变，太

① 《历代各族传记会编》1903页，《魏书·地豆于传》【丁证】。

② 《乌桓与鲜卑》

沁河即今洮儿河。乙力支所走的路线，如果溯黑龙江西上，无论如何也不能直接进入洮儿河，只有从今之嫩江与东流松花江才能进入。故“沂难河西上，至太沁河”，只能是指（由哈尔滨一带）溯东流松花江和嫩江进入洮儿河。到洮儿河河曲最南端今洮南附近，弃舟登陆，取最短路线到达朝阳（和龙）。十分明显，《魏书》所说的“难河”，就是指今之嫩江及东流之松花江。

难河，在同书《失韦传》中又称“捺水”，即《唐书》所称之为“那河”。《唐书·流鬼国传》载：“达末娄自言北扶余之裔，高丽灭其国，遣人渡那河，因居之，或曰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唐书》把那河与他漏河视为一条水，所以把那河“或曰他漏河”。他漏河即洮儿河，与洮儿河相通之水即嫩江。可见，此那河即今嫩江。

那河，在《辽史》中又称纳水。^①屠寄的《蒙兀儿史集》一书称嫩江为“纳活沐连”。^②张穆在其《蒙古游牧记》中指出，嫩江“又名诺尼江，古名难水，亦曰那河，明人谓之脑温江。”现代蒙古语称嫩江为“努文木仁”或“纳文木仁”。“木仁”即江，或为“木伦”、“沐涟”、“没里”、“穆楞”都是同音异写。“努文”即碧绿之义，这是因为其江水澄澈，色呈碧绿。保留古蒙语较多之现代达斡尔语称碧绿（白菜绿）为纳文。难、捺、那、纳、纳活、脑温、诺尼、努文、纳文、嫩，都是同音异写，为碧绿之义，嫩江乃因此而得名。

最早见于《魏书》的“难”（即现代达斡尔语的“纳文”），应是居住于这里的东胡后裔即汉魏晋时期的鲜卑人语言。由此可见，鲜卑民族的分布，当时东达嫩江。

六、失韦

失韦最早见于《魏书·失韦传》：“失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三日有盖水，又北行三日有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余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捺水。国土下湿。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颇有粟麦及稗，唯食猪鱼，养牛马，俗又无羊。夏则城居，冬逐水草。亦多貂皮。”同书《地豆于传》又载：“地豆于国，在失韦西千余里。”《北史》失韦作室韦，所记略同，唯“盖水”作“善水”。

从这些史料所提供的地望关系来推求失韦之方位，可以找到两个基点：1.“失韦国，在勿吉北千里”；2.“地豆于，在失韦西千余里”。

关于勿吉所在位置，《魏书·勿吉传》记载如下：“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去洛五千里。自和龙北二百里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瓌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可知勿吉在速末水流域。由太鲁水即洮儿河顺流而下“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由洮儿河河曲最南端即今洮南附近顺流而下，东北行十八日可达今哈尔滨一带。勿吉当即在这里。失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即以哈尔滨一带为基点求出其北千里之线，就是失韦所在之纬度线。

地豆于之位置前文已交待，在洮儿河以南的大兴安岭山地一带。以此为基点求出其东“千余里”之线，与勿吉以北千里之线相交之点，大致在今嫩江县一带，这就是失韦所在方

① 《辽史·圣宗纪》载：圣宗在大平二年、三年正月，均“如纳水钓鱼”。

② 《蒙兀儿史集》卷22：“斡赤斤原受农土，在蒙古东北面界外，活刺沐涟以北，跨有纳活沐涟”。

位。这里南与勿吉、西与地豆于均相距千里，恰成三角之势。

失韦之大体方位既已明确，则由和龙至失韦所经路线与山川，也可大致据以推求了。按《魏书》所记之路线：

“路出和龙”——即由朝阳之路北进，去失韦，如取直线路径，必当沿大兴安岭之东麓，经今开鲁县、科右中旗、科右前旗、扎来特旗等地，方能直趋嫩江县。走这条路线，按《魏书》所记的山川道里依次排列应大体如下：

“路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北魏当时之里较现在的里小，参考三国时代之里，其一百里约当今之六七十里，则朝阳以北千余里的契丹国，当在辽河流域之开鲁至通辽一带。由契丹到失韦还有二十七日之行程，如将这一段路程（从辽河到嫩江县）分作二十七等分，则每天约行五六十里，其行程应为：

“又北行十日至掇水，又北行三日有盖水”。此掇水似与《唐全要》所说的掇河不同，此掇水与盖水当在霍林河至洮儿河一带。

“又北行三日有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余里。”从洮儿河一带北行三日所经之大山，能称得起“周回三百余里”的，只有扎来特旗境内的神山。此山海拔858.8米，绝对高度在大兴安岭群峰之中虽不算首屈一指，但其相对高度则在五百米以上。东西横亘七、八十里，如合北魏时代之里，则周回当有三百多里。由此往北直至嫩江县一带，都是一些低矮的丘陵，所以，只有此山堪当“周回三百里”之犊了山。如果这个犊了山得以确指，则与之相关的其余山、川便都可以推定了。

“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由神山北行三日所迂的大水，当在雅鲁河一带。

“又北行三日有刃水”。刃水当在阿伦河一带。

“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渡过阿伦河再北行五日，就恰好到达嫩江县境了。

“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捺水”。嫩江县，有嫩江（上游）从北而来，故此捺水即嫩江。

将和龙至失韦之路程与所经山、河作如此排列，至少有三点较为切实：1. 失韦的方位定在嫩江县一带，与勿吉、地豆于之间的距离，跟文献记载相符。2. 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余里”，与神山的实际情况相符。3. 从朝阳至嫩江县之间，在霍林河以北有洮儿河、绰尔河、雅鲁河、阿伦河、诺敏河、甘河等河川，均系大兴安岭分水岭以东自西向东并行流入嫩江之支流。文献所记掇水以北诸河川依次排列大体都能找到恰当位置。虽然难以全部确指，但捺水与犊了大山这两个点确定以后，其余也便可大体推知了。

以嫩江上游当捺水，前人多有论述，各有所据，在此不赘。白鸟库吉等人以黑龙江当捺水，^①致与其相关之山川、部落方位均多舛错，早已不为史家所取。丁谦认为：“掇水在潢水北，即霍勒河。盖水即桂勒尔河。犊了山即达齐图岭，为索岳尔济山东面分支。屈利水即绰尔河。刃水即济沁河，一作音河。稜水即诺敏河。”^②济沁河并非音河。济沁河为注入雅鲁河南岸之支流，而音河则是雅鲁河以北与阿伦河并行的一条小河。此系丁谦之误。他以稜水（百衲本作捺水）当今之诺敏河，而诺敏河在嘎仙洞鲜卑石室之东南，这里正是乌洛侯之地域，故诺敏河不可能是失韦所在之捺水。

（下转47页）

①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

② 《历代各族传记会编》1802页，《魏书·失韦传》【丁证】。

“蕃汉马步都指挥使”这类高级武职。据《旧五代史》卷五三《李存信传》可知：“李存信本姓张，……父君政，回鹘部人也。大中元年（847年），随怀化郡王李思忠内附，因家云中之合罗川。存信通黠多数，会四夷语，别六蕃书，善战，识兵势。初为献祖（李国昌）亲信，从武皇入关平贼（指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引者）始补军职，赐姓名。大顺中，累迁至马步都尉……”。这里说明了两个重要情况，一是李存信原是出自南迁回鹘中由特勤温没斯率领的一支。如前所述，温没斯率众内附后，被唐封为怀化郡王，赐姓名李思忠，其部众被集中安置在云朔等州，正好与上引相合。再一点是，李存信曾参加了镇压黄巢农民起义的活动。由于李存信多权数，善征战，很得李国君、李克用父子的重用，官做到检校右仆射、检校司空。还有的回鹘人，在沙陀部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如“代居云朔间”的何庆、何怀福父子，“俱事后唐武皇为小校”。^①当然更多的回鹘人则充当了沙陀贵族的骑兵，诚如李克用炫耀的那样：“回纥（鹘）师徒，累从外舍，……控弦骑马，宁有数乎！”在推翻后梁建立后唐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后唐天成元年（926年），唐明宗李嗣沅即位，回鹘人张从训因与李嗣沅“有旧”，被“授右州刺史”。^②显然，张从训对于李嗣沅取代李存勖当皇帝一定有所赞助，否则不会仅凭“有旧”便遽迁州刺史的官职。及石敬瑭起兵，张从训仍然站在后唐王朝的一边，结果兵败遁逃。但由于张从训跟石敬瑭有着姻缘关系，所以在石敬瑭称帝建立后晋之后，依然让张从训作了“泽州刺史，检校太保”。后晋少帝石重贵时，又“以后父之故，超赠太尉”。^③另一回鹘人何建，则从小跟随石敬瑭掌管厩马。后晋建立后，何建“累曲禁军”，成为石敬瑭的心腹手足。天福年间（936—944年），又先后担任五镇节度使，官至检校太傅，位高权重，宠极一时。后契丹大举进犯，何建降于蜀，蜀主“孟昶待之甚厚，伪加同平章事，依前秦州节度使……，加伪官至中书令。后卒于蜀”。^④何建是以后晋高级官员的身份降于蜀国的，随同何建进入蜀地的回鹘人，肯定不会只他一个。由此可见，在五代十国的政治舞台上，回鹘人涉足的范围颇广，痕迹也是历历可寻的。

①④ 《旧五代史》卷94。

②③ 《旧五代史》卷91。

（上接40页）

综上所述，根据嘎仙洞鲜卑石室这一地理座标，可以确证：1.《魏书》所载之大鲜卑山就在大兴安岭北部。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祖先的最初居住地。2.推寅南迁之“大泽”，即今之呼伦湖。依此推论，先秦古籍《山海经》所载“东胡在大泽东”，即在今呼伦湖以东。3.乌洛侯地当嫩江中游，在今齐齐哈尔以西直到大兴安岭，北不过甘河，南不过洮儿河。4.地豆于在洮儿河上游以南之大兴安岭山地。5.难水包括今嫩江、东流松花江、东至入海。捺水即今嫩江（上游）。那河即今嫩江以及东流松花江。6.北魏时之失韦，在今嫩江县之北。